

江林昌

著

楚辞 与上古 历史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太阳循环文化揭秘

齊魯書社

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太阳循环文化揭秘

江林昌 著

齊魯書社

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太阳循环文化揭秘

江 林 昌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邮编:250001)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29千字

1998年5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33-0548-5
I·192 定价:20.00元

《楚辞》与古史

李学勤

烟台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江林昌博士，是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最后的弟子，于1994年取得博士学位。最近，他将其博士论文扩充修改，成为《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一书，将由齐鲁书社出版，要我作序。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义，便欣然应命。

《楚辞》研究早已是一门显学，近些年尤其很“热”。据汤炳正先生说：“从1977年以来，《楚辞》研究中出版专著已逾百部，在海内外各类报刊上发表论文已逾两千篇。这数字是惊人的，二者合计，它几乎相当于1977年以前的两千年《楚辞》研究成果的总和。”^①如果以这些数字去对照姜亮夫先生“文革”前出版的《楚辞书目五种》，^②更可以看出这门学问的迅速发展。

姜亮夫先生精研《楚辞》，长达几十年。他于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亲炙于王国维等先生。当时他专修小学，题目是《〈诗〉、〈骚〉联绵字考》，^③可知他已将精力倾注于《楚辞》了。江林昌博士研究《楚辞》，正是继续着姜亮夫先生的学术方向。

姜亮夫先生平生的业绩，世所共见。《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附录有《姜亮夫先生学术概论》一文，陈述师说，用不

着我再在这里多讲。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通过《楚辞》来探索古代历史文化的路子，实际是由王国维先生开辟的。

《楚辞》研究的历史非常久远，汉代学者已经给它作注，但就屈书扶微发覆，揭露出前所未知的历史事实的，却是王国维。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又促进了他提出影响深远的“二重证据法”。有关这一点的情况，值得我们在这里作一回顾。

王国维先生注意到《楚辞》所蕴含的古史，是与殷墟甲骨文的研究相联系的。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居住在京都田中村。^⑥1914年，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校写作序。这时，在甲骨卜辞中发现了商先公王亥之名，王国维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他在后来所说：“甲寅（1914）岁莫（暮），上虞罗叔言（振玉）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骸、《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⑦王国维把《楚辞》同各种史籍联系在一起，开拓了人们的眼界。

王亥史迹的辨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王国维在研究过程中，将他的发现告诉罗振玉，也和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谈过。内藤连续写了《王亥》、《续王亥》两文，刊登在1916、1917两年的日本《艺文》杂志上，^⑧其中提出希望发现更多的商先公名号。王国维于是继续钻研，竟“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而卜辞之季之即冥，至是始得其证矣。”^⑨王恒也见于甲骨文，其能与《楚辞》印证，更说明《楚辞》对

于研究古史的宝贵。

上述王国维先生的重要成果，均收入他1917年撰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篇名文中。这时他已移居上海。随后，他看到哈同、罗振玉收藏的更多的甲骨拓本，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1925年，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讲义《古史新证》开头便以这两文的内容作为主要基础。

《古史新证》的《总论》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又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⑧王国维先生的这种方法论的观点，自然是姜亮夫先生在受业时曾经接触到的。

因此，我们不妨说，江林昌博士在姜亮夫先生指导下作这部《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

当然，江林昌博士的《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王国维的考证。他从姜亮夫先生优长的文学史研究中，学习到很多重要的知识和方法。他也不是单纯地遵循姜先生的窠臼，而是广泛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等学科的观点、方法，注重提高研究的理论高度，这反映了学术界当前的一种趋势。书中通过一系列比较研究，更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也给理解《楚辞》这一古典作品拓广了道路。

注释：

- ①中国屈原学会、贵州省古典文学学会编《楚辞研究》，汤炳正《前言》，天津出版社 1992 年版。
- ②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 ③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第 304、309 页；《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姜亮夫先生本名寅清。
- ④甘肅《永丰乡人行年录》第 43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⑤⑦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第 1 页，《王国维遗书》第二册，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 ⑥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第 98～99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 ⑧王国维《古史新证》第 1～2 页，《清华文丛》之五，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序《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

王 宇 信

烟台大学中文系江林昌副教授的力作《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一书，是楚辞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它的出版，不仅将要推动楚辞学研究的前进，而且拓宽了楚辞学研究的范围，把楚辞中保存的中国上古史迹钩沉索隐，科学地加以整理，使人耳目一新，从而也会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产生相当的影响。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著名诗人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我国南方楚地特色的诗歌——楚辞，长期以来，人们都是把它作为与中原地区的诗歌总集《诗经》风格不同的古代优秀文艺作品看待的。《楚辞》自汉代结集成册以后，二千多年来传诵不衰，整理、说解、研究者不乏其人，从而在中国（甚至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专以《楚辞》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楚辞学。屈原的那些忧国忧民、充满哲理的名篇名句，对凝聚中华民族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一代宗师郭沫若写于1942年的历史剧《屈原》，赋予了二千多年前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以“新”生命，一个活脱脱的“三闾大夫”，被郭沫若的如椽大手笔再现出来，成为光明和正义的化身，呼唤着时代的霹雳，去劈开那“比铁还坚固的黑暗”，鼓舞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向侵略者和旧世界发动冲击。作为爱国主义诗人的屈

原，就更为千千万万的人们所熟知了。因此，以屈原作品为主的《楚辞》，一直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典范被人们代代传诵，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艺术文化珍品被继承下来的。

“礼失求诸野”。在中国古代典籍经过孔子和其后儒家“整齐化”以后，不少有悖于儒家教育的古史传说和古代史料被删芟或散佚。但在儒家影响较弱的南方楚国，却有不少流传下来，并被《楚辞》的不少篇章所称引。诸如屈原的《天问》，则自开天辟地以来，一口气提出了 172 个问题，堪称是一部史诗，保存了不少弥足珍贵的上古史迹。但前儒研究《楚辞》，多从文字训诂、章句说解等方面着手，虽然取得不小的成绩，但《楚辞》中保存的丰富上古史资料，也被这上千种研究著作所淹没。直到近代以后，学者们从多学科、多角度对《楚辞》进行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超过了前人，从而把楚辞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史学家开始注意把《楚辞》里有关篇章的古史传说资料与考古学、民族学和其他古文献相结合，重建中国上古史。这一有益的探索，使《楚辞》的不少篇章，被提高到“史诗”的地位。因此，充分“发掘”《楚辞》中保存的上古史迹，对史料较少的我国上古史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江林昌的《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阐幽发微，就是把《楚辞》保存的上古史陶铸出来的成功之作。可以说，如此全面而系统地“发掘”和恢复《楚辞》中埋藏的上古历史文化的研究专著，此书是多年来问世的第一部，必将引起楚辞学界和上古史学界的极大注意。而在近年海内外兴起的“楚文化”热中，本书正本清源，当也是一部有份量和有价值的著作。

我和江林昌先生是 1995 年在一个偶然的认识的机会认识的。这位

师出著名楚辞学家姜亮夫教授门下的青年博士，乐观、豁达、诚恳、自信。几度春秋，获得了博士学位。烟台大学的领导们慧眼识珠，热情而积极地迎接了他，并委以教学和科研的重担，使他在黄海之滨的更广阔的天地里求得发展。江林昌先生在烟台大学，与世无争，真是如鱼得水，一心扑在《楚辞》的研究上。他和我谈起《楚辞》研究，谈起《楚辞》中的古史传说，也谈到要把《楚辞》研究和古文字、考古学、民族学相结合，从古史研究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来。就是这次，他赠我一份博士论文，我才得以知道这位年青学者正在充实、修订这部受到答辩委员会前辈学者充分肯定的博士论文并准备出版。当我读这部博士论文时，一下子就被他充满探索精神的论说所吸引并从他的研究方法上也受到了不少启迪。

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江林昌先生的《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就要出版了。这部有价值的著作，不仅是江林昌先生汗水和心血的结晶，也充满了当代的伯乐们——烟台大学领导们的关怀和期望。江林昌先生的楚辞研究另辟蹊径，而烟台大学的领导们则为江林昌提供了“海阔凭鱼跃”的机遇与挑战。因此，在这部拓宽楚辞研究领域的著作出版的时候，学术界也应感谢烟台大学的领导们！

我相信，《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的出版，必将受到楚辞学界和历史学界的欢迎和重视，并会从中得到收获和启示。因此，我热诚地向朋友们推荐这部充满新意的著作！

于北京芳古园“入帘青小庐”

目 录

李学勤先生序	1
王宇信先生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提出：神话的价值与神话的被改造	1
第二节 论题确立：楚辞是我们认识上古历史文化的 一个窗口	5
第三节 原因分析：从楚族的历史和屈原的家世看楚 辞中历史文化资料的保存	8
第二章 由古文字中太阳循环观念论及《楚辞》与《易经》、 《易传》、《老子》、《庄子》中太阳循环观之异同	16
第一节 从古文字看我国古代太阳循环观念的存在	16
第二节 楚辞中所见太阳循环观念	22
第三节 《易经》、《易传》中所见太阳循环观念	43
第四节 《老子》、《庄子》中所见太阳循环观念	54
第五节 《楚辞》、《易经》、《易传》、《老子》、《庄子》 太阳循环观的异同及其原因分析	62
第三章 楚辞方位观念与殷代崇四、周代尚五	68
第一节 东方：日出扶桑	69
第二节 东西：日出于东，日落于西	71

第三节	东西南北：太阳循环	74
第四节	四方与五方：不同的文化背景	80
第四章	巫风观念探源与楚辞中所见巫风习俗讨论	89
第一节	巫风观念源于太阳崇拜考	89
第二节	楚辞中所见巫风习俗讨论	108
第五章	楚辞中所见殷族先公考	124
第一节	楚辞中所见殷族先公世系	125
第二节	殷先公称名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135
第三节	楚辞殷先公事迹中所遗存的殷商族早期 史影	145
第六章	天体崇拜与《九招》、《九辩》、《九歌》的源起 以及先秦若干音乐美学理论的形成	155
第一节	《九招》、《九辩》、《九歌》与天体崇拜	156
第二节	先秦若干音乐美学理论发微	172
第七章	楚辞中所见夏夷氏族图腾考	179
第一节	楚辞中所见夏部族诸图腾考	180
第二节	楚辞中所见东夷殷商族诸图腾考	194
第三节	考察楚辞中氏族图腾制的意义	203
第八章	楚辞中所见远古婚俗考	211
第一节	楚辞中所见原始群婚残余	212
第二节	楚辞中所见普那鲁亚婚	217
第三节	楚辞中所见对偶婚	219
第九章	楚辞中所见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诸现象考	223
第一节	“伯禹腹鲧”与争夺父系生育权	224
第二节	“厥身是继”与子女世系权的转化	230
第三节	“启代益作后”与父系军政权世袭制的	

开始	234
第十章 《天问》宇宙神话的考古印证和文化阐释	241
第一节 宇宙生成与太阳循环	241
第二节 洪水、鲧禹与夏族黑夜水体神话	248
第三节 十日、夷羿与夷族白天空中神话	254
第四节 两点启示	255
第十一章 《天问》所见古史传说及其意义	260
第一节 《天问》里所见夏商周古史传说和春秋列国 杂史概述	261
第二节 《天问》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	263
第三节 简短的结论	269
附录	272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篇宇宙观新探	272
履迹生子观念源于太阳崇拜考	287
两千年来楚辞研究的回顾与未来楚辞学的设想	303
后记	317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提出：神话的价值 与神话的被改造

人类从蒙昧时代，越过野蛮时代，等到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时，已经缓慢地经历了几百万年的时间。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原始人一直睁大着惊奇的眼睛，注视着周围的大千世界。他们苦思冥想，希望能对那些由于自己缺乏知识而感到神奇莫测的大自然作出一系列满意的解答。在探索认识自然社会的过程中，原始人常常以人自身为本体，去拟人、类化周围的一切。“类比解释是一种意指性活动，它给无意义的事物赋予意义，根据有限的经验来重新组织世界，为无限的现象找出原因，提供证明，从而不断地把主体对象化到客体之中，把客体同化于主体自身之中。”^①自然现象中，诸如日月星辰的移动，鸟兽虫鱼的飞动，都被赋予了人的情感。“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②于是，有了原始远古神话。人类学家们认为：“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的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原始人和它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溯中国神

话的“圣地”，揭开“创世”、“造人”和“祖先崇拜”的层层面纱，我们看到的将是先民对世界万物及人类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正如茅盾先生所指出：“历史学家可以从神话里找出历史来，信徒们找出宗教来，哲学家就找出哲理来。”^④

在以往，神话传说往往被看作是一种虚妄的东西。然而，随着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的出现，已逐步证明了在那些神话传说的背后，大多具有其真实的历史内核。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结合他几十年考古实践和古史研究的体会，在1983年3月号的《史前研究》上，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文章《衷心的愿望》，其中写道：“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我们能不能因此而对祖国的远古社会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这就成为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题。三十年来的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发展，充分说明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确实存在着我们的祖宗在这里劳动实践所遗留的社会史迹。从民族调查中发现有些‘传疑时代’的神话传说，还在一些少数民族间流传着。……从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和‘传疑时代’的某些部族里的可能有相当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从地望上，从绝对年代上，从不同文化遗存的差异上，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尹达先生的谆谆之言，值得我们深思。

神话属于原始思维，或称野性思维。只要我们把握神话这一特殊的思维方式，加以合理的破译，就能寻绎出其原始思维背后的本相，而这些本相大多可以与新出土的考古材料相印证。如，神话传说里，黄帝有二子，曰玄嚣与昌意，而相当于今天四川的蜀人的起源与昌意有关。《史记·五帝本纪》：“黄帝……

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华阳国志·蜀志》也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圉。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以往，在黄河中原文明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以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四川，不可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因此黄帝儿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的神话亦不可信。然而，1986年，在四川成都市北广汉三星堆早蜀文化遗址及其两个祭祀坑的发掘，却以大量可靠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神话传说有其历史依据。又如，在《山海经》里，有许多半人半兽的神话传说。《南次三经》：“……其神皆龙身而人面。”《西次二经》：“……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西次三经》：“……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北次二经》：“……其神皆蛇身人面。”对此，以往学者感到迷茫。然而，这些神话传说却可以与中国古代青铜器上大量的“人兽母题”纹样以及良渚文化玉璧上亦人亦兽的神徽等考古材料相印证。这说明《山海经》里半人半兽神话并非随意杜撰。文化人类学常识告诉我们，这人兽同体神话，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一个由动物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的过渡阶段，同时，还反映了原始时代曾经有过一种借助动物伙伴以沟通天地的巫术观念。由此看来，在考古材料大发现的今天，神话的史料价值已不容忽视，在上古历史文化的研究中，神话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一点，只要我们读一读李学勤先生的新著《走出疑古时代》，便会得到更明确的认识。

遗憾的是，当人类进入西周礼制社会之后，为了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便开始对上古神话进行了

历史化的人为改造。“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⑤“中国古典神话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化。这些神话人物在儒家正教的影响下，很早就演变成为上古时代的历史人物。”^⑥关于神话历史化倾向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孔子对“黄帝四面”和“夔一足”神话的改造。“黄帝四面”本是古人对四方四季的神话理解，但在《尸子》里，孔子竟然将黄帝四面改造成了黄帝手下的四位属臣。“夔一足”本是东夷初民所崇奉的帝俊太阳图腾神在夜间地泉的转形，但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里，孔子又将这帝俊太阳图腾神改造成了尧手下的一位音乐官，所谓“夔一足”竟成了“夔一，足矣”。

显然，神话的历史化倾向不利于我们对上古历史文化真相的认识。然而，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使其成为一种政治哲学而渗透于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领域。即使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为标榜的史官文化，也无不受其影响。例如，司马迁作《史记》，虽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其《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等所依据的材料，仍然是所谓“尤雅者”之儒言。于是，《史记》在关于上古史的记叙中，也无法避免其改造失实成份。这只要我们看一看《五帝本纪》中把“黄帝四面”说成是“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就十分清楚了，因为司马迁对黄帝四面的解释正是源于孔子并且使其进一步历史化、世俗化了。

早年，王国维先生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用甲骨卜辞和楚辞为材料线索，证明《殷本纪》中某些世系的真实性，在学界产生了极其深广之影响。一时间，《史记》作为信史而被